

走向与返回：中国文论的全球对话与话语建构

Towards and Return: Global Dialogue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杨 清 (Yang Qing)

内容摘要：中国文论既有其话语表述特性，同时亦具备世界诗学意义，既涵盖古今形态的跨时间转换与阐释，亦离不开与西方文论的跨空间对话与互鉴，其话语的建设自然无法与“古”“今”“中”“西”四个维度相割裂。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积极推动中国文论话语建构，逐渐呈现出一条普遍的学术路径。中国学者立足本土文论，通过“走向”世界诗学以观宏观诗学体系中的中国文论，最终得以“返回”原典历史现场，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开拓出一条“走向与返回”的跨时空对话路径。

关键词：中国文论；全球对话；话语建构；原典；曹顺庆

作者简介：杨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中西文论关系研究。本文为 2022 年度四川省社科规划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1 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东方元素”【项目批号：SC22EZD052】阶段性成果。

Title: Towards and Return: Global Dialogue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bstrac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not only has its discourse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has world poetic significance; It covers the cross-time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forms of literary theory, as well as the cross spatial dialogue and mutual learning with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discours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ancient,” “present,” “Chinese,” and “Western.” Chinese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Cao Shunqing,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gradually presenting a general academic path. Based on the local literary theory, Chinese scholars head “towards” world poetics to observe th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a macro poetic system, and ultimately “return” to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opening up a cross temporal dialogue path of “towards-return”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Keywords: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Global dialogu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Classics; Cao Shunqing

Author: Yang Qing is Associate Researcher at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Her major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Email: yangqing20131010@163.com).

本文在探析中国学者推动中国文论进行全球对话及构建文论话语路径时,首先想到的是法国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那本闻名遐迩的《迂回与进入》(*Le Détour et l'accès. Stratégies du sens en Chine, en Grèce*, 1995)。这并非暗指中国学者同样采用了于连的“迂回”与“进入”视角——受中国“言有尽而意无穷”话语言说方式启发,暂别熟悉的西方文明,“迂回”作为异质或参照存在的中国文明,进而反思欧洲思想。只是,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中国文论话语展开的研究,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中西对话,呈现出“走向”与“返回”的研究路径。于连的“迂回”是为了提供“进入”。同理,“走向”是为了得以“返回”,通过“走向”世界诗学,从而“返回”中国本土话语,或反思,或阐释,或构建。这并非是一条单向的由外至内的“反躬”之旅。事实却是,中国学者不时地“走向”全球,又不断“返回”本土,呈现出循环往复的中西比较研究路径。其中,尤以曹顺庆的研究为典型。细数曹顺庆从事学术研究四十年,他笔耕不辍,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出版专著/编著30余部,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甚至是整个中国人文社科领域贡献了“失语症”“跨文明研究”“变异学”“比较文学阐释学”等鲜明的学术观点。然而,曹顺庆在学术研究方面真正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成就,不仅仅在于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专著或任何一个学术观点,重要的是他敢于直面中国文论界话语缺失困境而首先提出文论“失语症”,并用四十年学术光阴围绕这一学术“痼疾”探索出一剂“良方”:通过中西对话返回原典历史现场,从而进行本土话语构建,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开拓出一条“走向与返回”的新的研究路径。事实证明,这是一条兼具学理性和实践性的话语建设之路。

一、寻根溯源:“失语症”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

中国文论话语建构这一命题的提出,源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和文坛掀起的一股反思“失语”之风。早在1990年,黄浩就认识到中国新小说因为“语言革命”而患上了“失语症”,导致新小说说话困难。¹无独有偶,邵建亦发觉中国文学界患上了“失语症”。²夏中义则认识到20世纪出现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后殖民”现象,“导致自身传统危机乃至艺术、学术‘失

1 参见黄浩:“文学失语症——新小说‘语言革命’批判”,《文学评论》3(1990):35。

2 参见邵建:“‘精神失语’及其文化批判”,《文艺评论》6(1994):35。

语’ ”。¹中国文论同样也患上了“失语症”。曹顺庆率先总结了中国学界提出“失语症”之由，乃是针对20世纪末中国学界转型期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即面对西方文艺理论的不断涌入，学界一味“以西律中”，结果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²而后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曹顺庆更是在开篇疾呼，“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文论失语症！”（50）。

“失语症”引起众多学者讨论，并从本土走向世界，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或出版专著，在国际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促进中国理论话语建设。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讲席教授顾明东曾在国际比较文学界知名国际期刊《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上发表“文学开放：跨越中西文学思想鸿沟的桥梁”一文，以中国文论“失语症”为切入点，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当代中国理论事实上是西方理论思想的一个分支。尽管中国和西方学者都不断呼吁在中西文论之间真诚地进行对话，然而，绝大多数的对话最终都沦为伪对话或伪装的西方独白。³清华大学生安锋在国际比较文学权威期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评论》（*Neohelicon*）上发表“理论旅行，抑或理论转型：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变形”一文，认为从1995年到1999年，后殖民批评话语在中国的兴盛引起了诸如中国文论‘失语症’、中国文论重建等问题。⁴

“失语症”提出已有二十余年，中国文论话语建设成果如何？是否已经建立起来？现在重提“失语症”是否老调重谈？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失语症”提出以来，曹顺庆、蒋述卓、施旭、赖大仁、孙绍振、王本朝等一批学者致力于中国文论的建设，积极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施旭于2014年出版英文专著《中国话语研究》（*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专门探讨包括中国哲学、文论在内的中国话语问题，以期更有效地进行中国话语、中国文化研究，让中国文论话语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学界。曹顺庆自提出“失语症”这一问题以来，一直致力于如何解决“失语症”、如何重建中国话语工作。在批判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存在的种种弊端与缺憾的基础上，曹顺庆积极进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设，笔耕

1 参见 夏中义：“假说与失语”，《文艺理论研究》5（1994）：19。

2 参见 曹顺庆：“21 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3（1995）：215。

3 参见 Gu Mingdong, “Literary Openness: A Bridge cross the Divid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ough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 (2003): 112-129. 凡无特殊注明，本文英文书名及英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4 参见 Sheng Anfeng, “Traveling Theory, or, Transforming Theory: Metamorphosis of Postcolonialism in China,” *Neohelicon* 2 (2007): 115-136.

不辍，书写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自己的理论话语，相继出版《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2000）、《迈向比较文学新阶段》（2000）、《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2001）、《比较文学学》（2005）、《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2005）、《比较文学概论》（2015）等理论专著。2013年，曹顺庆首部英文专著《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面向全球出版，更是将中国学者的声音传递到西方世界，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这本专著正是中国学者敏锐地认识到中国文论“失语症”后，积极重建话语的有效成果。

尽管，“失语症”话题引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但距离中国文论体系真正建立起的那一天还有待时日。孙绍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失语症”提出已有二十多年，对于重建中国文论新话语的口头响应者尚属寥寥，实际践行者则更是不多。一味“以西律中”，对西方文论过度迷信，有越来越猖獗之势，于是大声疾呼：老朽已老！年轻人，请站出来，跟西方文论家对话、争鸣！¹中国文论的重建非一朝一夕之功，仍需学界持续关注和实践。不断审视“失语症”，积极促进中国文论话语重建，对新时代建立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中西文化平等对话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走向”全球：中西融通

既然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起因在于中国文论患上了“失语症”，那么具体应如何进行话语建设？王洪涛针对中西文化交流长期失衡、中国古典文论囿于本土等问题，认为“目前建构中国文论国际话语体系的可靠路径是逐步实现中国古典文论从本土走向西方进而走向世界的跨越，依次完成其从‘翻译诗学’到‘比较诗学’再到‘世界诗学’的转化”（177）。中国文论自古以来便是世界诗学的一部分，自然离不开与世界诗学的对话。不论是中国古代文论“体大虑周”之作《文心雕龙》，还是近代中西文论融合之代表《人间词话》，均吸收、融合了外来因素而作，更不论中国现当代的文论构建，多为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理论耦合的结果。从于连“迂回与进入”的研究路径深亦可见，“在中欧（西）‘间距’之间，以一方为参照去审视、反思另一方的思想与文化，可以创造远景思维空间，从而开拓一条中西对话、文明互鉴的理想路径”（吴攸 46）。可见，“走向”全球确为中国文论建设的一个路径。

曹顺庆进行中国文论话语构建的第一步即由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开启。早在20世纪80年代，曹顺庆跟随“龙学泰斗”杨明照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时，便开始有意尝试中西比较诗学研究。1988年，曹顺庆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诗学》，被饶芃子评为“新时期出现的第一部《中

1 参见孙绍振：“医治学术‘哑巴’病，创造中国文论新话语”，《光明日报》2017年7月3日，第12版。

西比较诗学》的专著”（18），从此从古代文论转向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并非是简单的“X+Y”的比附，亦非比较孰优孰劣，而是打破中西异质文化之间的理论壁垒，立足人类共同审美形态与规律，找寻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话语体系中的共同“诗心”。而“诗心”发掘正是曹顺庆多年来进行理论创新的原始动机，即通过“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寻找各民族对世界文论的独特贡献，更重要的是要从这种共同的‘诗心’和‘独特贡献’中去发现文学艺术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建立一种更新、更科学、更完善的文艺理论体系”（《中西比较诗学》270-271），从而改变中西话语不平等对话、中国话语缺失的现状，让中国声音走向世界，让中国话语积极参与国际话语，与西方一同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

意欲实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中西诗学比较是不够的，还应跳出诗学这一专门领域，着眼于文明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尽管，中西诗学比较为国内学者打开国际视野、参与国际对话打开了一大窗口，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真正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推动此项工作全面开展的是曹顺庆随后提出的跨文明研究。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中，曹顺庆接续中国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提出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设想，率先系统阐释了其基本特征及核心研究方法，提出跨文化研究是中国学派的基本特色，形成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形态。而后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文中，曹顺庆旗帜鲜明地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经历的三大发展阶段，即“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形成了国际比较文学“涟漪式”的理论结构。¹随后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曹顺庆进一步深化学科理论的建设与阐释，在“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一文中，应对21世纪国际学界出现的“文明冲突论”“文明威胁论”等西方有关文明问题的声音，正式提出跨文明研究以解决比较文学学科原有理论已无法完全适应当前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学术研究，开始从跨文化研究转向跨文明研究。²

既然跨文化研究以其对文化“异质性”的强调，凸显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研究特色，为何还要再提跨文明研究？曹顺庆认为，“只有‘跨文明’才能真正彰显比较文学此次重大转折的基本特征，并且不至于与目前被滥用和乱用的‘跨文化’一词相混淆”（“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71）。而“跨文明研究”的特点就在于：一是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二是在研究异质性的基础之上促进不同文明的互补，三是在保持文明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异中之和”或“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³之所以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

1 参见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比较文学》3（2001）：1。

2 参见曹顺庆：“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中国比较文学》1（2003）：70。

3 参见曹顺庆：“跨文明研究：把握住世界学术基本动向与学术前沿”，《思想战线》4（2005）：60-61。

再提跨文明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曹顺庆立足的是东西文明的碰撞与交流，而非文明下面的单个文化形态。这就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比较文学原本就是极具开放性、包容性、平等性的一门学科，自然不应囿于以欧洲文明为中心的跨国的影响研究、跨学科的平行研究，而是冲破文明界限，将包括东西方文明在内的全人类不同文明形态的知识统统囊括进来，形成真正的全球性研究；其二，不同文明形态均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表征，跨文明研究的提出从根本上质疑了西方根据达尔文进化论而提出的文明发展阶段论、文明优劣论等文明观。可见，跨文明研究不仅推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的建设，更是以中国声音解构了国际学界长期存在的狭隘的文明观，促使中国比较文学话语开始走向全球。

如果说跨文明研究的提出开始促使中国文论话语走向全球，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的建构则是一次真正的中国理论话语走向全球的有效实践。无论是早年间曹顺庆提出的跨文化研究，还是后续更为深层次的跨文明研究，其研究的起点均为“异质性”。所谓“异质性”并非如其字面意思那般一味凸显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原本就存在差异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自不必赘述。但从文明形态来看，“异质性”强调的是不同文明形态本身所具备的独特性，与西方所主导的趋于同质化、单一性的全球化浪潮截然相反。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来看，“异质性”立足的是东西比较文学得以成立的合法性，即东西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构成了东西比较的理论基石，否则比较的意义何在？这正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所忽略研究领域。

过去，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脱胎于欧洲文化，不会面临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问题，因此才会诞生以跨国为特征的影响研究、以跨学科为特征的平行研究，两者均强调同一性。然而，一旦非欧洲文化进入东西比较文学研究场域，文化之间的差异凸显。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无法完全阐释由东西文化差异带来的现象与问题。正是对“异质性”的发掘与强调，曹顺庆逐渐将“异质性”理论化，将之视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构建的基本架构之一。其所主编的《比较文学论》一书并置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而后者就包括“异质比较研究”“异质话语对话理论”“异质文化融合研究”等针对“异质性”的研究。¹

然而，“异质性”毕竟是文明的静态表征。从古至今，不同文明一直处于碰撞、交流的动态过程中，正如钱念孙所言，“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在纵向上与自己的历史传统处于前后连续之中，同时又在横向上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处于相互交往之中”（1）。宋明理学对叔本华“生命意志”观产生影响，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之思源于老子的思想，庞德对中国诗歌

1 参见曹顺庆：《比较文学论》，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的创造性翻译直接促使美国意象派的诞生，印度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等文论著作产生影响，王国维《人生词话》得益于与西方理论的融合，诸如此类的文明动态交流在人类文明史上不计其数。

既然文明交往处于“动态”过程中，由于叶威廉所言之“文化模子”¹的不同，一国/文化/文明的文学或文论传播至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势必会发生程度不同、形态多样的变化：或根据接受者的文化背景与期待视野发生客观变化，或由于误读与原意产生偏差，或因为适应接受一方的文化语境而有意改写，或因为语言转换产生意思的失落或增添。即便是“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其中也不乏种种变化。“影响研究”中的形象学研究，其实就暗含了变化因子。一国文学形象因其是一个民族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让-马克·莫哈 29）必然不会原封不动地挪移至他国文化，势必会产生形象变化。

曹顺庆将这种跨国、跨语际、跨文化、跨文明传播中产生的“变化”进一步理论化，称之为“变异”。2005年，曹顺庆首次提出“变异学”这一比较文学研究的全新视角，认为应从“跨越性”“实证性关系研究”“变异性”“总体文学”四个方面进行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新范式的建构。²这一概念并非凭空提出，而是从整个人类文学历时发展来看，不同文明中的文学体系之间存在钱念孙所言之“横向发展”，因此产生碰撞、交流、变异。因此，“变异学”的提出乃是针对人类文学交流史中的客观规律而言。这其中就有两层含义：一是承认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异质性”，二是强调不同文明交流之间的“变异性”，而这两点构成了“变异学”的两大理论基石。

三、“返回”本土：古今中西对话

尽管，曹顺庆始于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着眼于创造具有世界性的国际理论话语，但他始终没有脱离过本土文论，反而一再强调需从本土文论中不断挖掘理论范畴，重新阐释中国古代文论，从而创新文论话语。其中，曹顺庆一贯坚持的“原典阅读”模式俨然已成为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与育人的一大范式。

何谓“原典”？许慎《说文解字》释“典”为“五帝之书也。从册在艸上，尊阁之也”（200）。“典”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本意即指重要书籍。对“原”的强调则同《文心雕龙·原道》中的“原”字那般，如范文澜注：“《淮南子》有《原道训》，高诱注云：‘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3）。”“原”蕴含推论本原、考镜源流之意。因此，“原典”即是“返回”中华文化重要典籍的历史现场，回溯本初含义，阅读“原汁原味”的文献，而非做文献的“二道贩子”。值得注意的是，曹顺庆所强调的“原典”既包括诸如《十三经》、诸子集成等中国古代典籍，也包括外

1 参见叶威廉：《比较诗学》，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第1-26页。

2 参见曹顺庆：《比较文学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文原著，以求在“原典”阅读的基础之上，打通中西。

问题是，比较文学学者为何要阅读“原典”？其实这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建设紧密相连，亦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一大规律。曹顺庆曾一针见血指出，“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必然会失语。（……）当今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没有真正地从原文读过原汁原味的‘十三经’，读过‘诸子集成’，以致造成了近日学界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没有学术大师时代”的反思》90）。“原典”阅读是解决“失语症”的一剂良药，亦为学术话语创新的源泉。

尽管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属西方“舶来品”，但其实早在这门学科在西方建制之前就已经在中国存在并产出了一批重要成果。若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萌芽，最早或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论史上第一部自成体系、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何以最终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空前绝后之作？实际上，《文心雕龙》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源于刘勰对中国典籍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乃受外来影响的缘故，并且并非单单是如学界所达成的普遍共识那般受印度佛典的影响，而是在立论上受印度佛经论理思辨方式的影响。¹叶嘉莹认为，因刘勰“依沙门僧占，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贾锦福 424）。其所从事的正是佛经的“区别部类”工作，故刘勰深受印度佛经中的因明学一派的论理思辨方式，长于归纳、整理、思辨。而这种影响恰恰在《文心雕龙》中体现为分门别类地对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学现象及理论范式进行体系性地论述。

如果说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首先体现为中国文学理论范畴的变化，诸如严羽《沧浪诗话》中的“妙悟”、皎然《诗式》中的“取境”，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境界”等范畴均为佛教思想影响的结果²，更深层次的影响则是论理思辨方式的影响——以异质文化中的话语言说方式阐释中国丰厚的本土思想，甚至衍生出新的文学理论体系，这便是曹顺庆所提文学变异学之他国化的内涵，亦为《文心雕龙》得以成就的根本原因。可见，刘勰《文心雕龙》当可算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萌蘖。在此并非是要为中国比较文学进行“寻根”，而是想说明，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即立足本土原典，化用异质因子，创造性地进行理论构建。

前有刘勰深谙自先秦时期以来的中国典籍，并以佛理思辨方式进行系统阐释，后有王国维立足本土诗学进行中西对话。王国维深受西方文论影响，借叔本华“意志”论阐释《红楼梦》，在《人间词话》中借用西方“新学语”阐释中国文学与文论，不仅丰富我国诗学阐释内涵，还为我国比较文

1 参见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12-113 页。

2 参见 梁晓虹：“论佛教词语对汉语词汇宝库的扩充”，《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994）：188。

学、现代诗学及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¹但王国维并非一味引进西方“新学语”，而是立足本土诗学阐释的需求，在大量阅读古今中外典籍之后，深感中国学术话语的不足，认为“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40）。正是因为对古今中外原典的充分掌握，王国维才能从中看到中国学术话语的缺憾，才会大力提倡引进西方“新学语”，并身体力行，积极进行中西诗学对话与理论建构，成为中西诗学研究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无独有偶，钱钟书亦是在古今中外原典的阅读之上进行学术研究，其代表作《谈艺录》就是这样一部中西文论交流与对话的佳作，不仅广泛诠释中国古典诗词与诗学，更是援引西方诗学进行辅助阐释，秉持“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1）的中西融通精神，力求寻找人类共同“诗心”。钱钟书在谈及中国古代“诗乐离合”时，不仅细数《乐府总序》《白石诗说》等中国古代原典中有关“诗乐”的论述，还在论及中国古代有关诗词与八股文体之间的冲突时，援引西方美学有关利害冲突的理论观点进行互释²；论及《艇斋诗话》中论诗当讲“活法”、《论语》讲“从心所欲不逾矩”时，援引恩格斯诠释黑格尔“自由即规律之认识”、康德认为想象力当有“自由纪律性”、黑格尔所言精神“于必然性中自由”、歌德所言之“欲伟大，当收敛。受限制，大家始显身手；有规律，吾侪方得自由”（钱钟书 292-293）等西方理论观点与中国古代诗学进行对读。诸如此类的中西文论对读与互释的例子在《谈艺录》中不计其数。而钱钟书之所以能够对中西文论如此运用自如，一方面是因为钱钟书国学基础扎实，其所撰《宋诗选注》《管锥编》《七缀集》即是代表；另一方面则源于其广阔的国际视野，其在英国完成的“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学位论文即为典型。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大家均起步于原典阅读，这成为了不言自明的一个学术规律。遗憾的是，这个规律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讨论，亦未被有效运用至中国文论话语建设之中。除上述刘勰、王国维、钱钟书诸外，王元化从《文心雕龙》研究走向比较诗学，朱光潜充分结合其国学功底与西方典籍阅读底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美学理论体系，季羨林同样也是熟读古今中外原典才成为东方学大师，国学大师钱穆在论述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化时亦会将视野投向西方，在《中国文化之唯心主义》《中国的哲学道德与政治思想》《新三不朽论》等篇目中进行中西文化、哲学与不朽观的比较研究³。无论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者，中国文论史上的大家均成长于原典，并始终穿梭在古今中外原典之中，从中找寻到学术创新点，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一

1 参见 杨清：“王国维的‘新学语’观与文学横向发展论”，《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4（2021）：97。

2 参见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93页。

3 参见 钱穆：《钱穆先生全集·历史与文化论丛》，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65、83、118页。

套话语体系。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因其天然的中西比较视野，区别于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中西比较就意味着要在“古”“今”“中”“西”四个维度中建立起话语体系，势必要将原典纳入其话语构建的基本框架之中。无论是诸如《十三经》《文心雕龙》、诸子集成等中华文化原典，还是《诗学》《美学》等西方典籍，均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构建话语体系之时无法绕开的知识宝库。可以说，没有原典阅读，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比较文学。原典阅读已然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亦是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一个客观规律。

立足于原典，才可能进行进一步的阐释研究。近年，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基于中西比较研究，致力于比较阐释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话语。2022年，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学科重要话语：比较文学阐释学”一文中，首次系统提出“比较文学阐释学”这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话语，亦是“比较文学阐释学”真正意义上在国内的首次重要发声。¹“比较文学”与“阐释学”原本是两大学科，而比较阐释这一实践方式亦长期存在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之中，二者的有机结合并非是简单的叠加，而是融合了比较文学学科中的中西打通规律、阐释学学科中的阐释逻辑与阐释方法论，形成新的理论话语。比较文学阐释学是一种老实践、新话语，大致发展出了基于六朝佛经翻译的“格义”、以王国维和钱钟书为代表的古今中外“打通”、基于刘若愚《文学理论》研究的“以西释中”等比较阐释方法²，对国内学科范式构建与方法论界定始终存在的模糊性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方法归纳。

可见，“阐释”是构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话语的一大方式。问题是，为何一定是“阐释”？这是话语构建本身的规律所致。“话语”（discourse）在西方现代批评理论中意义重大，成为现代和后现代构建人类主体的最重要工具³，本源自拉丁文“discursus”，在语言学上本意指讲话。而福柯将“话语”上升到言说权力，成为一种“生产有关人类及其社会的知识的系统，它的真理是相对于学科结构而言的，也就是使话语得以制度化了的逻辑框架，进而通过制度化了的的话语获得或给予权力，对我们施加影响”（陈永国 228）。所谓“话语”即为一种“元语言”，尤指言说方式，与言说权力相耦合。掌握了言说权，自然掌握了话语权。既然“话语”涉及言说，自然需要在阐释中得以呈现。阐释即是实现话语的直接方式。当前，中国理论话语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如何构建中国理论自己的

1 参见曹顺庆、张帅东：“比较文学学科重要话语：比较文学阐释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22）：87-94+215。

2 参见曹顺庆、张帅东：“比较文学学科重要话语：比较文学阐释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22）：87-94+215。

3 参见陈永国：“话语”，《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

话语权、如何把话语传出去，成为当前中国学界的一大难题。而比较文学阐释学则从话语阐释的角度提供了一条路径。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力图参与到国际学术话语建设之中，重新认识中国本土话语，从而阐释自己的观点，建设自己的话语体系。其中一个方向即为重写文明史。重写文明史并非是危言耸听之论，而是深刻认识到“失语症”对中国学界带来的危害以及与之相连的话语构建的另一研究方向。文明是当前国际讨论的核心问题，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¹，福山提出“文明终结论”²，却始终听不到中国的文明观。近年，中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文明互鉴论”³，参与到国际学术话语建设之中。然而，西方文明观大多凸显西方优越感而贬低非西方文明，却长期在国际文明史书写中占据重要位置，缺乏非西方文明观的介入与对话。有鉴于此，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呼吁“重写”，包括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世界文明史，贡献中国观点，从而“返回”本土，建设自己的话语体系。可见，阐释即是实现话语言说的直接方式，而话语则在不断阐释之中固定下来，从而成为理论范式。

“走向”全球，一方面是通过“他山之石”，汲取理论养分，另一方面则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返回”本土，一方面是需要立足本土，将外来理论因子与本土文化融合、创新，进行中国化，从而成为中国理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是重新审视本土理论，从本土理论中不断挖掘理论宝藏。“走向”全球的前提是立足本土，其最终目标乃是为了“返回”本土、构建中国文论话语，如此形成了循环往复的话语建设之路。这正是中国学者进行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普遍路径。中国学者不断在“走向与返回”所编织的循环往复中西对话与比较网络之中，穿梭于古、今、中、西这四个时空维度，向着多元化、跨学科的方向垦拓，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话与交流已成为中国学术研究不可阻挡的趋势，尤其在学科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屡结硕果，在赢取国际学术话语权方面亦卓有成效。2016年，张隆溪成功当选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成为首位获此席位的华人学者；2019年，乐黛云荣获法国法兰西学院授予的首届“汪德迈中国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2022年，曹顺庆受牛津大学出版社邀请为国际最新编撰的《牛津文论

1 参见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2 参见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3 为破解西方建立在“社会科学知识生产领域中产生的话语的‘文化霸权’”之上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学界将“文明互鉴”理念理论化，提出“文明互鉴论”。参见 张恒军：“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格局”，《对外传播》9（2022）：13。

百科全书》撰写“中国文论”词条¹；2022年，首次以中国学者为主要力量编撰的《国际比较文学新视角》（*New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²由英国剑桥学者出版社出版，以中国视角选编国际比较文学最新成果，以中国话语阐释国际比较文学出现的新现象与新内容，向国际学界发出中国声音。

Works Cited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2（1996）：50-58。

[Cao Shunqing. “Aphasia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Morbidity.”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tention* 2 (1996): 50-58.]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Theory*, edited by John Frow. New York: Oxford UP, 2022. 1605-1622.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中国比较文学》1（1995）：18-40。

[—.“Chinese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It’s Theory and A Tentative Study of It’s Methodology.”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 (1995): 18-40.]

——：《比较文学论》。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engdu: Sichuan Education Press, 2002.]

——：“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中国比较文学》1（2003）：70-84。

[—.“Cross Civiliz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Turning Point and Construc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 (2003): 70-84.]

——：《中西比较诗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

[—.*Comparative Poeti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1988.]

——：“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3（1995）：223-237。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Oriental Series* 3 (1995): 223-237.]

——：“‘没有学术大师时代’的反思”，《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3（2005）：88-90+95。

[—.“Reflection on the ‘Age without Academic Master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3 (2005): 88-90+95.]

——：《比较文学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engdu: Sichuan UP, 2005.]

Cao Shunqing et al. *New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1 参见 Cao Shunqing,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Theory*, edited by John Fr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1605-1622.

2 参见 Cao Shunqing et al., *New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22.

Scholars Publishing, 2022.

曹顺庆、张帅东：“比较文学学科重要话语：比较文学阐释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22）：87-94+215。

[Cao Shunqing and Zhang Shuaidong: “Important Discours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isciplin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rmeneutics.”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2022): 87-94+215.]

陈永国：“话语”，《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222-231。

[Chen Yongguo. “Discourse.” *Key Word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dited by Zhao Yifan, Zhang Zhongzai and Li De'e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222-231.]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Gu Mingdong. “Literary Openness: A Bridge cross the Divid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ough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 (2003): 112-129.

黄浩：“文学失语症——新小说‘语言革命’批判”，《文学评论》3（1990）：34-44。

[Huang Hao. “Literary Aphasia: Critique of the New Novel ‘Language Revolution’.” *Literary Review* 3 (1990): 34-44.]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贾锦福编：《文心雕龙辞典》。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年。

[Jia Jinfu, ed. *Dictionary of Wen Xin Diao Long*. Jinan: Jinan Publishing House, 1993.]

梁晓虹：“论佛教词语对汉语词汇宝库的扩充”，《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994）：184-191。

[Liang Xiaohong. “On the Expansion of Buddhist Words to Chinese Vocabulary.” *Journal of Hang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1994): 184-191.]

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Liu Xie. *Annotations on Wen Xin Diao Long*, annotated by Fan Wenl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7-40。

[Moura, Jean-Marc. “On the Research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of Literary Imagolog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magology*, edited by Meng Hua. Beijing: Peking UP, 2001. 17-40.]

钱穆：《钱穆先生全集·历史与文化论丛》。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Qian Mu. *Complete Works of Qian Mu: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ssays*. Beijing: Jiuzhou Publishing House, 2011.]

钱念孙：《文学横向发展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Qian Nianshun. *On the Horizontal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1.]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Qian Zhongshu. *Tan Yi Lu*.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7.]

饶芃子：“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及其走向”，《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1989）：14-21。

[Rao Pengzi. “The Revival and Trend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Journal of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1 (1989): 14-21.]

邵建：“‘精神失语’及其文化批判”，《文艺评论》6（1994）：35-39。

[Shao Jian. “‘Spiritual Aphasia’ and Its Cultural Criticism.”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6 (1994): 35-39.]

Sheng Anfeng. “Traveling Theory, or, Transforming Theory: Metamorphosis of Postcolonialism in China.” *Neohelicon* 2 (2007): 115-136.

孙绍振：“医治学术‘哑巴’病，创造中国文论新话语”，《光明日报》2017年7月3日，第12版。

[Sun Shaozhen. “Cure Academic ‘Mute’ Disease and Create A New Discourse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Guangming Daily* 3 July 2017: C12.]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文集》（第3卷），姚淦铭、王燕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40-43。

[Wang Guowei. “On the Input of New Academic Words.” *Collected Works of Wang Guowei (Volume 3)*, edited by Yao Ganming and Wang Yan. Beijing: China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1997. 40-43.]

王洪涛：“从‘翻译诗学’到‘比较诗学’与‘世界诗学’——建构中国文论国际话语体系的路径与指归”，《中国比较文学》3（2021）：176-188+75。

[Wang Hongtao. “From ‘Translation Poetics’ to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World Poetics’—The Path and Guidance for Construct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3 (2021): 176-188+75.]

吴旻：“中西互鉴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从弗朗索瓦·于连对中国智慧的跨文化思考谈开去”，《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022）：42-51。

[Wu You.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From Francois Jullie’s Cross Cultural Reflection on Chinese Wisdom.”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Jinan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 (2022): 42-51.]

夏中义：“假说与失语”，《文艺理论研究》5（1994）：19-20。

[Xia Zhongyi. “Hypothesis and Aphasi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5 (1994): 19-20.]

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Xu Shen. *Annotations on Shuowen Jiezi Zhu*, annotated by Duan Yuca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1.]

杨清：“王国维的‘新学语’观与文学横向发展论”，《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4（2021）：97-108。

[Yang Qing. “Wang Guowei’s View of ‘New Academic Words’ and Literary Horizontal Development.” *Modern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4 (2021): 97-108.]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Ye Jiaying. *Wang Guowei and His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叶威廉：《比较诗学》。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 年。

[Yip Wai-lim. *Comparative Poetics*. Taipei: Dongda Book Company, 1983.]

张恒军：“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格局”，《对外传播》9（2022）：12-15。

[Zhang Hengjun.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Civilization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9 (2022): 12-15.]